

氏一旦革命告成，而懷疑其於英國本身之利害得失者，亦不乏人。惟作者以為倘弗氏革命告成，其於英國之利害得失，不辯可知。蓋弗氏失敗，西國亦化，不特可使葡萄牙政府發生傾覆之虞，且共產宣傳勢將散佈北非；伊斐利恩半島（Iberian Peninsula）亦將現岌岌不安之象，其影響地中海與法蘭西諸地，自不可言喻。蘇俄之共產獨裁，已予英國商業莫大之打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以西班牙苟能統治其本國，管轄其鄰屬，則不獨英國人民所引為欣慰，且亦為西班牙全國人民所切望者也。今弗郎哥之運動係以法律、秩序、解放、公平及耶教之原則為其基礎，非以國社理論或法西斯蒂原則為其依歸。則其與英國文化相符，而與共產專制相背，彰彰明甚。

一九二

日人之中日經濟提攜觀 鄭克成

中日經濟提攜這個問題，已經兩國識者發表過不少意見，但是能在客觀的立場作敏銳之批評者卻不多見。日本尾崎秀實君在改造（Kasei）雜誌五月號中做了一篇「日支經濟提攜批判」，很能在客觀的立場批評本問題。今摘錄大意於左。

策之必要。日本近年對華政策急激推進者，有以下諸原因：（一）最近日本資本主義之急激發展；（二）日本在東亞之地位顯然強化；（三）日本熱烈要求獲得大陸上之戰略的地位；（四）在華之日本勁敵，英美不得不取守勢之事情之存在；（五）中國經濟的危機之深刻化及其資產階級政權之無力化。但是對華政策之推進，遇到障礙，就是：（一）日本財政國難之增犬；（二）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抗之昂進；（三）列強，尤其是英美採取了新攻勢。

第二、日本之軍部以為戰術上當確定新方針，從向來多面的方針轉移到集中的戰術。這和對於日蘇關係之結論的考慮相關聯的。因為日蘇抗爭之際，中國之向背有重大之意義。今日的中國正在促進其統一和建設，全然和昔日因軍閥混戰而四分五裂的不同。日本之軍部認為中國是戰術上的敵手，要想把中國從其他主要敵手分開來。

第三、日本現在急欲改編其經濟為「準戰時體制」。中國是原料生產地和商品的市場，在日本經濟是極有價值的地方。本來在日本方面早有中日經濟提攜的要求，但每不能奏實效，今則以中日親善或經濟提攜之形態再抬頭。

第四、國民政府已備國內統一之形態，同時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路。這是世界各國所強烈感到的印象，日本承認這種事實者也很得勢。去年七月西南政權之屈服，十二月西安事變之經過都表示着國府之實力。還有十月間民國成立二十五年國慶紀念日，國府事實

中日經濟提攜論不始於今日。今日所以得勢者，第一由於一九三一年以來大陸政策之推進陷於停頓狀態，要打開新局面，有出於新方

上指導者蔣介石五十歲誕辰，都表示着十分熱鬧。這種事實使得日本人大大呼要變更對華認識。

二

日本經濟界之有力部分，對於滿洲事變及上海事變都抱有遺憾的意見。這種意見是發源於和中國本部有密切的經濟利害關係之日本經濟界。然而在日本政界及言論界，也有相類之意見表示出來。中日親善論乃至中日經濟提攜論，大部分從此產生出來。這種中日親善論乃至經濟外交論是日內外部對於大陸政策急激推進之一種抗議，恐任何人所知道的罷。

滿洲問題告一段落，同時出現的是日本和中國本部之經濟關係調整的要求。日本經濟界最初逡巡於對滿投資，就是帶這種性質的。還有，和世界經濟集團化的要求相關而以「中日滿經濟集團論」的形態出現出來的。這個中日「滿」經濟集團論，除本來的經濟要求外，還包含着和中國本部經濟調整的意義在內，是不可忽視的。例如豬谷善一氏關於中日「滿」集團曾經有這樣的話：

日本領導之中日「滿」集團要在中日「滿」集團內之經濟的互助，就是應該排斥專在擴張勢力之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確立集團內諸國能平等享受利益之經濟上有無相通的政策。第二，是滿洲及華北之開發。

華北問題因通車（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設關（十二月）通郵（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等要案解決，達到一定之安定點以後，中日經濟提攜論得到抬頭之機會，自是理之當然。還有，華北關係之安定同時產生對華外交一元化論。這不但是中國方面之切實的要求，並且有修正大陸政策之意義，其性質和經濟提攜論相同。

從蔣介石任行政院長後，都預想中日外交當急速展開。爲了走私問題和駐兵問題，中國對日感情惡化以後，連續發生成都北海等不祥事件。這時的中日交涉，在日本方面，不但要解決事件本身，還想一舉而解決中日根本問題，但是結局歸於失敗。接着發生綏東問題。在這個問題裏面，某種大陸政策的意向在活動着，是不可否定的事實。本問題以內蒙軍之失敗而告終。這時又發生了西安事件。這事件經南京政府解決。最近中日經濟提攜論便是在受到這樣重要事件之經驗後發生出來的。這種中日經濟提攜論，在日本方面，有相當堅強之理由，似沒有問題的罷。

三

最近日本經濟使節之赴華和佐藤外相在議會中之演說，包含着日本對華經濟外交之新的意思表示，值得注目。又在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開會議決支持中國之幣制，並且要求中日經濟提攜。日本方面對華和平外交之熱烈的要求，從此可以窺見。

還有，日本評論界之主要潮流，現在強調國民政府之統一全國，中國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政策上可視為主張中日經濟提攜者。太田宇之助說：「中國不統一，則中日間無和平。」平貞藏氏，矢內原忠雄氏都有相類之見解。以上諸人非必直接主張中日經濟提攜論，乃是關於中國向資本主義國家的統一邁進，喚起日本人之注意，主張從來之大陸政策應該改換其頭面，力言對華援助之必要。

矢內原忠雄氏尤其熱烈的主張修正對華政策，他說：

中國問題之中心點，是在認識向民族國家統一建設邁進的中國。

惟有合乎這種認識的對華政策，方是科學的正確。最後成功的實際政策，也不外乎此。惟有根據這種認識承認中國之民族國家的統一而援助之，纔能救中國，救日本，救東洋之和平。倘使強行違反這種認識的獨斷政策，那末，災禍永貽於後代，苦中國，苦日本國民，苦東洋之和平。日本之對華政策應該根據前述之科學的認識，復歸到正常之道。這是中日國交調整之一大鐵則，並且是惟一的鐵則。日本經幕府末葉尊王攘夷論的沸騰，由明治政府成就了民族國家建設之事業。日本國民有着這種近代史的經驗，對於中國問題之所在，不該有同情和理解麼？明眼的讀者照以上之論旨，當可推察我的主張——日本對華政策應當如何反省？如何修正？如何轉變？

四

中日經濟提攜之意義，除前述對華政策轉變之政治的意義之外，還有日本對華經濟的關心之深切。中國因為國民政府經濟建設的進步，產業開發的進步，其為外國商品輸出市場，愈加重要。世界市場中日本商品之輸出市場，多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影響之下，受着關稅壁壘，進口限額，以及其他限制，前途愈加困難。因此中國市場更加重要。試將日本之對華輸出和列國比較如次：

	日本	英國	美國	德國
一九三三年	一〇%	一一%	二二%	八%
一九三五年	一五%	一一%	一八%	一〇%
一九三六年	一六%	一一%	二〇%	一六%

從上面統計，可以看出日本已克服滿洲事變後排日之影響，增加其輸出。此外考慮華北的特殊貿易（走私）及滿洲市場上日本之獨占地位等，日貨輸出市場的中國，不得不說是愈加重要。

中國又是原料生產地，將來經濟開發進展，這一點，越發要增加重要性。這事和國際資本國家備戰忙有關，看了中國輸出之旺盛和輸出品之內容，可以知道的。

國際投資的新形式是工業國提供借款。這種借款由債權國提供鐵路材料礦山及其他工業材料，由債務國供給債權國所必要之原料，充償債之用。列國之對華商務關係，今後採用這種方式，大堪注目。

以上種種的擁護和促進，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需要經濟的親善。還有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列國正在以「經濟提攜」方策和中國聯絡。日本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七天羽聲明中不許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又反對中國之幣制改革，也是這樣意思。但是日本實質上沒有這種力量。日本靠大陸政策深入華北的時候，列國之「經濟提攜」在國民政府歡迎中很容易的向中國產業開發邁步前進。此際，日本站在列國對華經濟提攜之圈外，究不能堪。這裏可以看出中日經濟提攜之最重要理由在於日本對華北密切關係之中。

一九三五年中日經濟提攜成問題的時候，外務省關於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以（一）在華北積極提攜工作；（二）對於中國全體勸獎中日兩國國民之經濟提攜為二大目標，研究具體方案。此際，關於華北積極的經濟提攜，也考慮到將來中日「滿」三國之經濟提攜。這一段朝日新聞的記載，很可以明瞭其間之情形了。

華北經濟提攜之方向，第一，在於開發原料資源；第二，在於開拓日貨販賣市場；第三，在於確保並創設有利的投資物件。華北經濟的開發，應該從屬於政治的軍事的要求，所以先着手合乎政治的軍事的要求之事業。

110729

日本之華北經濟工作，從一九三六年以來，着着具體化。首先創設資本千萬之興中公司，入夏以後，更成立各種日本資本之企業。資本系統有二：其一是國家的資本（經由興中公司）；其二是紡績資本。與

中公司在八月間設立了資本八百萬元之中日合辦天津電業公司。紡績資本在數月之中以驚人之步調在華北活躍。

此外田代和宋哲元訂立了協定六條，其內容如次：

- 一、津石鐵路（石家莊天津間二八八公里）。
- 二、塘沽築港（塘沽為主港，大沽為副港，兩港經費約三千萬元）。
- 三、白河水利事業。
- 四、龍烟鐵礦（埋藏量約九千萬噸，含有量百分之四七到五七，設立中日合辦龍烟製鐵公司，資本三千萬元，在天津設製鐵工廠）。
- 五、井陘煤礦（埋藏量二億二千萬噸，一九三四年出煤量一七五三千噸，資本五百萬元，原為中德合辦，日本收買德商之股）。
- 六、植棉（傳聞由紡聯、棉花同業會，在華紡組織五百萬元之財團法人於冀東擔任華北棉花開發事業）。

五

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難點，第一是政治問題。日本在華北已着着實現經濟提攜。這和日本在華北之政治軍事的壓力有密切之關係。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難點，是冀東政權之存立問題，特殊貿易問題，駐兵權問題，自由飛行問題等。這種種問題不但是華北一隅之難問題，並且是中日間中日經濟提攜全局之難問題。傳說三中全會宣言原案曾言明察北冀東問題之解決是中日經濟提攜之前提條件。又中國方

面會對日本經濟視察團說：解決政治問題，是實現中日經濟提攜之前提要件。

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難點，第二是日本資本與中華民族資本利害之不一致。中日經濟提攜之際，中國不甘以農業國自居。蔣介石在他的英文本「中國經濟建設」當中，曾經說過：「一國倘要與世界各國爲伍，那末，根本條件是工業之發達。所以中國倘要爲平等自由和他國奮鬥，必先從農業國進於工業國。」中國最重要的工業是紡績業，所以在這點上，日本資本和中華民族資本有利害不一致的地方。

日本與中國都不否定中日經濟提攜之可能性，但矢內原氏說：中華民族國家所排斥的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領土的支配，不是經濟的資本的連結。這是錯誤的。現階段資本主義國家之活動，決不會純粹限於經濟的資本的範圍的。具體的說，華北經濟開發（中日經濟提攜之最重要的內容），至少是循着日本大陸政策之路線而進行的。這種經濟的資本的方法走不通時，大陸政策之本來的方法，必然會發動的。

中日經濟提攜之最大難點，不在於和國民政府之交涉，卻在以下之二點：（一）正面反對大陸政策之中國抗日民族運動；（二）日本因爲在華北有政治軍事經濟的關係，對華要求特殊地步。但是英國等列強之資本已與國民政府有密切之聯絡，在國民之壓倒的支持之下，向全中國活動。日本不得不處於與列強爲敵之地位。以上兩個根本問題之解決，不能專靠經濟提攜之普通方式，可以斷言的。

一九三

斯托克何耳門派的儲蓄與投資說

張素民

原名 "Some Notes on the Stockholm Theory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 係 Bertil Ohlin 所作，載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份之皇家經濟學社季刊 (The Economic Journ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Vol. XLVII No. 185)。

在經濟衰落的初期，瑞典經濟學家研究就業、出產、與物價等的變動所採之理論的工具，即與經濟教科書中的價格學說不同。然而瑞典學者所得的結論與克恩斯 (Kjynes) 的新說有許多同點和異點。本文的目的，即在比較斯托克何耳門派的學說與克恩斯的學說。將另寫一下篇，批評克恩斯的學說。

一、斯托克何耳門派學說的發展與特點

我們要知道瑞典經濟學的趨勢，必從威克隨耳 (Wicksteed) 說起。他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 *Geldzins und Gueterpreise* 及以後的著作中含有「全體出產的理論」(“a theory of output as a whole”) 的種子。他從「一物的價格是由供給與需要」一事實論起。如一物的價格上漲，我們說：這是由於需要對供給的增加。如一般物價水準上漲，我們應可採用同樣的解釋。威克隨耳由分析儲蓄與投資而爲這種解